

4. 船楫如梭的商贸“脏腹”

船楫与海洋融合了合浦郡文治文化、物质、资源的腹地。2000多年前，汉帝置合浦郡，它就成了岭南地区历代的商贸、文化、经济所在地。踏入合浦，到处感受到它的悠久历史与辉煌的气息。“武帝（汉武帝）威德远播，薄海从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梯山航海，源源而来，现在辐辏肩摩，实为海疆第一繁庶之地”。可见汉代合浦港对外贸易繁忙的盛况是空前绝后的。

全国出进口的货物全部都汇聚到了北海合浦港，在合浦旧城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到港的货船，人们、商贾，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的语言熙熙攘攘，形成了北海合浦一道特殊的风景。

合浦作为始发港，船行西南，到日南（今越南）、都元（苏门答腊）、邑卢没国（泰国华富里）、湛离国（泰国境内巴蜀）、夫甘都卢国（缅甸）、黄支国（印度东岸）等航线。海外贸易输出的主要是金、银、铜钱、珍珠、铅、锡、瓷器和各种纺织品，输入的主要是各种香料、药材、犀牛角、象牙、珊瑚、琥珀、玛瑙、水晶等。来自东至日本，西至大食（今阿拉伯半岛），南至东南亚各国，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

合浦以海上丝绸之路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郡市繁荣。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瓷器、茶叶均产自江南一带，岭南地区的合浦处于内江和外海的交汇处，从运河和长江的贸易船只要出海，必定经过合浦。它也是海上补给、船舶维修、人员歇息之地，即此成为了对外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南北文化交融、物流交汇于合浦，它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而且占据着海岸线，有着独特南国风情及海滨风光。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兼并刘表领地之后，其势力不断向岭南扩张。吴交州刺史步骘抵达番禺，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

藪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也。”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交州治所从广信（今广东封开）迁至番禺，岭南的政治中心又回归番禺。孙吴政权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决定以合浦以北划为广州。

合浦郡辖地很广。东起今广东的开平至新兴一带，北起今广西容县至横县一带，西起今广西防城至邕宁一带，南达今广东徐闻至阳江一带。其次今海南省全境（即儋耳、珠崖），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其中今广东境内约35000平方公里，今广西境内约35000平方公里，海南省34000平方公里。郡境北倚丘陵山区，南临大海，海路直接与东南亚各国接壤。陆路有南流江入海通道连接漓江、湘江、珠江水系进入中原水运网络。南流江水系流入合浦郡境入海形成了多数入海口，随即成为便捷的出海港口郡。汉代时的合浦郡港口群囊括了今天的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铁山港、合浦三叉港群、海口港、三亚港、榆林港、湛江港、徐闻港、电白港、阳江港等，这就是西汉沿海十八郡的海域。其中出海也包含有交趾、日南（今越南境），乐浪（今朝鲜境）。尤其是合浦郡群港，其指的是上洋江、总江港、乾江港、三叉港、永安港、英罗港、白龙港等健全完备港口与南流江形成独特的海路纽带及出入海道的水运网络，这是古合浦成为秦汉时期唯一一条具有内陆水路直通大海的岭南地区的重镇。由此可观，这条航海线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

合浦郡，作为海上贸易之“大宗”者，当首推丝绸。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其更具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统治者重视农桑，致力垦荒，这是许多大臣都提出的建议。永安二年（公元259年），景帝孙休下诏：“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于士民之贍，必须农桑，……田桑已至，不可后时。”孙吴政权对丝绸生产的重视的同时还在海昌屯田时“督劝农桑”，诸暨、永安等地也生产御丝。除此之外，永嘉还贡八蚕之绵。可见，丝绸生产区域得到了扩大和发展，合浦郡的农桑、丝绸产品

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自从官营丝织自三国孙吴始创以来，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这个时期由于合浦海之路的原因，它带动了合浦郡丝织业、茶叶业得到不断的发展，这是自海上“丝绸之路”到海上“茶瓷之路”的重大发展。

合浦海上丝路成了岭南地区“承前启后”的拓展，促进了航海事业与海外贸易的繁荣。合浦除了丝绸之外，还有如茶叶、陶瓷等之类的物资，都一概从此路运输出去的。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历代以来，中国各地窑口的陶瓷器汇集沿海口岸，源源不断地运销海外，很受各国人士欢迎，这是由于中国的陶瓷制作工艺相当成熟，其瓷器所特备的优点：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等。这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宋末至清初，中国对外贸易的瓷器是当时各国商贾的追求达到狂热程度的一种标志。

瓷器起于汉代，盛于三国、唐宋。其瓷器的胎质、釉色、纹饰以及烧制技术都臻于完善，尤其是青瓷制造技术更为成熟，孙吴的陶瓷业，也有官营的性质。东起东南沿海的苏、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都相继设立了陶瓷器作坊。最有名的是越窑，产地在绍兴、慈溪、宁波、岭南一带。它的产品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装陶器工艺的传统，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制瓷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镂、雕、堆和模制等技术。除生产大量的日用瓷器外，还生产大批精美的殉葬用的冥器。

《中国陶瓷史》记载：当时越窑产品，经曹娥江航运到杭州湾，然后向西运抵山阴城（今绍兴市）；或经运河直达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等大城市；或向东南入海运往各地。

海上“茶瓷之路”带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输出海外，对欧、美各国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法国，一开始从广州大批购瓷器，在本土开设工厂，仿造中国

瓷器。当时的法国国王曾给予一家工厂 30 年的专利权，专门生产仿中国货的碗、盘、碟、瓶等产品。当时，瓷器已普及整个法国社会，最受欢迎的是一种轻巧纤美，莹洁润泽，白底绘彩色人物花鸟的中国瓷器。

南宋朱或《萍洲可谈》：“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说明了那时期珠乡口瓷器的旺盛发展到达了鼎盛，珠乡的陶瓷艺术塑造、建筑园林陶瓷、手工业用陶器等通过珠乡的“海上之路”不断输出国外。

陶瓷从中国大量出口，不仅满足了他国的需要，也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同时也促使中国本身的陶瓷生产进一步发展。因此，海外市场愈广阔，生产竞争也愈激烈。在外贸的刺激下，各地窑口不断改进烧造技术，提高工艺水平，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茶是我国传统的饮料，原产巴蜀，秦并六国，开通灵渠，茶种遂由水道传到荆楚吴越。据《上虞县志》载，在汉时我国东南沿海山区已有野生茶树，名曰“大茗”。东汉末，丹阳道士葛玄在天台华顶山植茶、修炼，人称葛仙翁，后游会稽，在宛委山学道。三国、晋代会稽士人已有饮茶习惯，唐代会稽山区已有茶树种植，越地名茶颇多，屡见于唐诗。隋时，开凿京杭大运河，钱塘江北又有上塘运河与萧山西兴运河相接，连通萧绍平原西小江又与开凿于春秋时代为越王勾践复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的“山阴故水道”相接，跨越曹娥江，始与浙东姚江、甬江相通而出海。后世明州（今宁波）成为通商口岸，其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港市。

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茶瓷之路”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孙吴对于开辟这条航道所立下的不朽功绩。

海上丝路不仅带动了中外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是外来文化的入口。合浦由于地处“海上丝绸之路”源头，开发早，对外交往频繁，外来宗教历史悠久，文化景观占用空间深广，影响也较大。佛教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 年），由“海

上丝绸之路”经交趾合浦港传入岭南。南朝（527年），禅宗始祖达摩泛海抵广州合浦，创建西来庵。

南朝宋文帝元嘉初年（424年），天竺僧求那跋摩来南海转合浦后，上中原入京。梁武帝初，天竺僧智药三藏创建南华寺。禅宗最初由达摩带人，到六祖慧能逐渐消化成本土禅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奠定了自己的派系，南华寺成为了中国禅宗的发祥地。

岭南文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敢于并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合浦人从来就是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宽容大度、从容淡定、乐观自信的。这使合浦码头港接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和印度禅宗从海上之路首次传入中国本土。

中国几千年来，经受两轮文化的碰撞交融，即二西（以佛教为先锋的西土文化——印度文化，以天主教的西洋文化——西方文化）之学。当然，思想只能在冲突碰撞和融会中产生，正是岭南合浦这一地方，具备了多种元素间的冲突和融合，既有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华夏儒学间的冲突，又有佛学内部的冲突，更具备正统思想薄弱，而边缘思想继兴，本土文化滞后，而西土文化乍人的地域文化特征。慧能的产生，正是一位合浦人对产生于北方的正统学术的扬弃，他使佛性平等观有了最充分的体现。这是合浦给中国的第一次文化上的大贡献。

在古代佛教传播过程中，往往都对该地区文化传播有较多的贡献。寺院不仅是一个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化人聚会的风雅之地。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力量，自唐代以后，形成五家七宗、“一花五叶”，影响很大。唐宋至明清，禅宗逐步传到国外。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甚至在六祖的年代就有人开始修习曹溪禅。现在更远传至澳洲和美国、加拿大、法国等欧美国家，全世界有佛教的国家就有南华寺的法脉，南华寺已成为国际上的禅宗祖庭。

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是以科学为手段，来达到他们传教的目的。实际上，他们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传播着力最多，介绍最细的并不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而

是西方的宗教与哲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介绍。希腊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于中国宗教文化来说，它完全是异质的思想，正是这种异质性对中国宗教文化的传统思维造成了冲击，正是这种异质性才表现出了中西哲学交流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进步作用。这是晚明思想界流于谈禅及空疏无用的心性之学的一剂良药。

其实，“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贯穿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特征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凝聚力的紧密程度，相应地给各种异质的行为越来越采取融会贯通的形态”（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这是每个有生命力的自强不息的文化所必然具备的特性。各种各样的区性的或民族性的文化，在它成长、壮大和成熟的过程中，都会和外部环境接触，因而产生冲突、适应与替代，直到出现难分难解的文化吸纳和融合。“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碰撞交融，佛教、基督教的传播，彰显合浦文化具有趋于整合的特性，具有文化更新、与时俱进的面貌。而具有这种文化的合浦人，更有奋斗的精神和自立的能力，不怯懦，有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勇气；不琐碎，有开阔的胸怀和眼光；进取、坚毅、大度，则是岭南汉文化中的一支“主力军”。

走进合浦的“汉墓博物馆”，立刻就能感受到一种悠远古朴的气息。从汉墓群出土的各种各样的文物，保存完好，它是达官贵族们生前日用的必需品乃至尊崇物，也见证了大汉时期合浦郡文化、经济与海之路的繁荣盛况。

走进另一个展馆，琳琅满目的古物，我们仿佛看到大汉的浩浩船队，从大海向合浦驶来，隐约还能听见滔滔水声，船帆随风浮动，栩栩如生。整个汉藏馆仿佛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四周珍藏着许多史料和实物。如今的会馆犹如一个航船博物馆，海上丝绸经过古今无数船只的传递飘向远方，传播着当年在合浦发生

的一幕幕感人故事。

山归山，海是海，合浦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景，南流江看海边每天日出霞落迎来了多少渔舟与勤劳惠女的身影。北海边汇聚了国际贸易集地中心，每天来往的商船川流不息，上岸的渔船海鱼数也数不清，日出而运舟，日落而归航，这成为世世代代珠乡合浦人居住在海土交融的这片热土上的一种习俗。

以合浦始发港为枢纽，加强中原与西南地区沟通与联系，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通道。同时也为西南地区的物资进入海洋，为海上贸易的商船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出海口。合浦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大西洋出海的大通道了，它是始发港，同时它还是一个中转港。中国陶瓷、丝绸及产品，出口到印度洋各国及欧洲国家几乎都是由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出发的，贾船转向送至远航的主要海上交通要道。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任务是往外运转的商品，主要的商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铁铜器四大宗，往回运入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海上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

到明代初，郑和七次下西洋，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颠峰。

郑和之后，明朝政府以防御倭寇为名实行重农抑商的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开始封关锁国。就连民间造制的“两桅以上的大船”也禁止出海劳作。从而，使中国的航海业走向消亡的边缘。

清康熙时，政府正式公布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为通商贸易地点，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四个海关，主持对外贸易，史称“四口通关”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兴起。到乾隆时，又关闭其中三个，只剩广州实行“一口通关”。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于1842年8月29日签定中英《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上海、宁波、福建、厦门五个通商口岸，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放，在国际交流史上，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互惠互利，睦邻友好的。一艘艘满载精美瓷器、珍珠、香料和质地优良丝绸的商船，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后，开始了从事对外贸易的漫漫西行之路。优越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经济腹地，丰富物产资源的合浦引领了海上丝绸之路集市的繁荣。唐代刘禹锡用诗歌“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描绘了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而韩愈笔下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则是另一种气势：“货通狮子国，乐奏粤王台”。从东南沿海到南中国海，再延伸到波斯湾、非洲西海岸，甚至更远的地方。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又有多少历史之谜等待着人类去逐一破解呢？合浦郡作为海洋文化的主要载体，船舶的作用不言而喻，成为他们远航的工具。它架起了我国在海上通往世界的桥梁，连结了五大洲人民的友谊，在我国古代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昔日合浦的“海上丝绸之路”宏大的航海图渐渐在历史中淡去。湛蓝色的海湾幽幽地卧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在寥寥渔舟唱晚声中，寻声遥望那“千船竞海”的磅礴景象，广袤无边的海浪中隐遁着合浦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之音，也收敛了它曾经的繁荣和骄傲。

合浦由于河流泥沙淤填，陆地已向大海延伸了几公里，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汉代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历史。

然而，泛北部湾的珠乡海港经过海水的数千年的洗礼，今天并没有褪色，反而被“漂洗”得更加光彩夺目，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着来自五湖四海远道而来的贸易商船。